

环境置换与群属特征的形成:以东干人为例

马登杰

【提 要】东干,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些重要的群属特征的形成,与其外来侨民(回回)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置换有关,围绕东干的这一情况,尝试探讨一下有关环境置换与群属特征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族群 环境置换 东干人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09) 06—0135—05

回族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居住在境外,在中亚的称为东干人。众所周知,东干人特指 1877 年~1878 年间由新疆喀什及伊犁地区迁至沙俄统治下的中亚七河地区的几批陕、甘回民,其中多数为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余部。东干人,确切地说,就是指“中亚回族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东干人是中国境内回族在中亚的一个移民群体,她与境内回族属同源异境之关系。笔者认为,东干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一些重要的群属特征的形成,与其外来侨民(回回)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置换有关。

何谓环境置换?在本文中,它是指伴随着族群迁移而发生的某一族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的现象。就是说,族群迁移的结果,使某一族群在适应新的环境时,而必然发生的一些族群特征的改变,新的群属特征形成的普遍现象。

本文围绕东干的这一情况,尝试探讨一下有关环境置换与群属特征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东干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历了多种文化的融合,这就是从清朝时期的外来侨民(回回)移居到中亚受到中亚多种文化的影响而到现在的“东干”(前苏联在 1924 年民族识别、民族划界时,把他们定为“东干”民族成分。)她的这一演变,始于外来侨民(回回)所处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随迁移而发生置换,继而与中亚这一新的环境之间发生的长期互动,甚至是在其制约和影响下完成的。

关于“东干”一词,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来自“东岸”,有的说来自“东关”,有的说来自“敦煌”,有的说来自“潼关”,有的说来自当地民族语言中的“turagn”(留下的,停下的,住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院士、历史学博士、著名的东干学家穆哈麦德·苏三洛教授在他写的一本名为《东干人(历史与民族学概述)》的书中,认为东干人来自“东甘”,即东部甘肃的意思。事实上,自 18 世纪起,陕、

甘、宁、青籍的不少回族农民和士兵就移居新疆，便被当地说原居地民族语言的民族称为“通干”(Tungan)。19世纪下半叶，部分回族人移居中亚后，又被当地各族人称为“东干”(Dungan)。关于“东干”一词的解释，我倾向于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先生的意见。^①这一支华人穆斯林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迁移到中亚去的呢？据已故的穆哈麦德·苏三洛教授和胡振华教授的研究认为：这一支华人穆斯林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入俄境的回族后裔。当时起义失败的部分回族人分三批进入俄境的：第一批是1877年11月由大师傅（译音）带领甘肃籍回族1166人，由新疆乌什县翻过大坂进入俄境，住在卡拉考勒，另一部分陕西籍回族3314人，由白彦虎带领，经喀什噶尔西北的乌恰县图尔呷特隘口进入俄境，住在托克马克；第二批是1878年初由马大人带领的新疆吐鲁番一带的回族1779人，经喀什噶尔西北乌恰县的斯木卡纳进入俄境，住在奥什；第三批是1879年以后的几年里，由新疆伊犁地区进入俄境的回族4682人，住在阿拉木图、热湖一带。这三批移入俄境的回族共计10941人。

从那时起到现在的100多年里，这支华人穆斯林的人口不断增多，几乎增长了9倍。人口总数已过10万，散居在今哈萨克斯坦（约4万）、吉尔吉斯斯坦（约4万）、乌兹别克斯坦（约2万）的28个居住点上。其中，陕西籍回族移民后裔约占东干人总数的55%，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籍回族后裔约占45%。这些回回移民，就是东干人最早的来源。他们在当时的中亚，属于所谓“移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今天，东干人在语言、姓氏、服饰等方面与境内回族已有很大区别。19世纪后半叶迁往中亚等地的东干人，与当地的原居民以及从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十分显著，比如说在物质文化、语言及生产经营方式上就有许多不同。在新的人文环境下，东干人为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必须做出一定的反应，因此他们迁移后的生活与在中国原居住地的生

活情况相比就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他们原先在中国扮演了一个整合统一——与汉族姻亲不断的角色，那么在新的人文环境下，东干人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群属特性。这里应当指出，东干人在文化方面，特别是语言方面的变化，是在新的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在自然生态方面，他们能够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分享着原居民族所拥有的“地大物博”丰富多样的资源；在人文社会方面，对其影响至深的则是回族、汉人社会、汉语言、汉文化这一环境。不用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所曾拥有的环境。

二

东干人所处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发生置换，体现在其群属特征方面，就是处处打着新的环境的烙印，证明了环境因素对群属特征形成的重要影响作用。

1. 东干人的语言特征

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东干人使用的语言，是来源于我国晚清时期西北回民汉语方言的东干语。这种语言里，保留了不少我国古汉语、中古汉语、元明清以来的白话词语，如奘、酃、停分、口里、打交、怪道、端相、使唤、路数、营生、开年、晚西、停当、便当等。还保留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一些晚清词语，如京城（首都）、衙门（政府机关）、衙役（警察）、大人（当官的）、帮办（长官的副手）、铺子（商店）、钱庄子（银行）、贴子（货币）待诏（理发师）、吆车的（司机）等。东干人根据他们交际时表达的需要，还新造了一些词，如：飞船（飞机）、水船（轮船）、黑明（昼夜）、图影（照片）、拓影子（照相）、话头（书的前言）、大巷子（大街）等。有时候东干人的一些概念需要用词组的方式来表达：如出

① 胡振华：《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伊斯兰世界》2000年第2期。

② 胡振华：《生活在中亚的一支华人穆斯林——东干人》，清真书局，中文学术城，<http://www.islambook.net/>。

了世的（出版）、开肚子的（外科医生）、往山上跑的人（登山运动员）、那个人有两个脸（两面派）。

在东干话里有不少外来借词，从俄语中介入的最多，也有部分英语借词。据 Ф. Н. 哈娃子统计，这种借词多达几千条，约占东干语词语总量的 7%，其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家庭、饮食、服饰、用品等。如巴尔基阿（党）、伏拉斯奇（政权）、列窝柳茨阿（革命）、考拉号子（集体农庄）、康比尤特（电脑）、基万（沙发）、布拉基（连衣裙）等。其次是原居地民族语借词，如：赫尔赫孜（吉尔吉斯）、巴家（连襟）、考姆孜（三弦琴）、那雷（肉末面条）等是吉尔吉斯语，冬不拉（二弦琴）、瞎仔（现在）等是哈萨克语，皮牙子（洋葱）、坎土曼（锄头）、巴丹母（巴丹杏仁）、巴扎（集市）等是维吾尔语。东干语中的波斯、阿拉伯语借词一般比国内回民的要多，如阿斯玛尔（天空）、朵斯提（朋友）、杜什曼（敌人）、都瓦（祈祷）、乃玛子（礼拜）、舒拉（赎罪日）等。

东干人不识汉字，通常使用俄文书写。20 世纪 30 年代，东干学者在“小儿锦”基础上创制了包括 35 个阿拉伯文字母东干文字。1928 年，华人穆斯林又根据拉丁字母创制了新的东干文，其中有 31 个字母，并用这种东干文编辑出版了学校教科书及文艺著作。至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各少数民族又开始了斯拉夫字母化的文字改革，一些俄罗斯文字专家及东干文化名人如尤·杨尚新·亚瑟儿·卜娃子等，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新的东干文，共 38 个字母。这套文字一直使用到现在，并出版了《苏联回民报》。新的东干文保存着东干人丰富的民间文学，其中有“曲子”、“口歌”、“口溜”、“倒口话”、“猜话”、“古今”等，同时新的东干文也发展了东干人的教育事业。^①

显然，东干人在接受汉语（陕、甘方言）作为其共同的族群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接受汉语这个我国主流语言的过程，主要是应民族内部交往需要而产生的。在中国，汉语是回族的母语，回族本身没有自己

的民族语言。回回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重要标志，便是来源不同、语言各异的穆斯林也都开始使用汉语，同一个民族有了同一种语言。显然，回族接受汉语作为其共同的民族语言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在其原有的某种主要语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基础上直接形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接受汉语的过程。从全国来看，它也不是一个主要应民族内部交往需要而产生的，主要是与汉族，或通过汉语而与其他少数民族，甚至与讲不同语言却同为外来穆斯林移民的交往时的需要而产生的。如西北地区回族使用西北方言，云南回族使用云南方言。^②

东干人使用的东干语，无论从来源上讲，还是从语言本体角度观察，仍然是中国陕甘方言的一个特殊变体，是汉语的一支方言。但对中亚的东干人来说，它不仅是自己的母语，而且也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即他们常说的这是回族话，不是汉话。这种看法在西北地区回民当中也存在着，其主要原因是西北地区往往在同一区域内，回、汉民操用同一方言时，也确实有一些差别，这种差别除回民语言中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外，还有一些如声调或简单谓之“腔调”的区别。如甘肃临夏（河州）方言就有回族腔，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汉语方言也有回民方言和汉民方言的区别，这些差别使得回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同一区域的汉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国，这种差别并没有使回族认为自己所使用的方言就是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并没有产生民族语言的意识。

但对中亚的东干来说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就是回族的语言，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这种民族语言意识是特殊条件下母语意识强化的结果，这种母语意识是伴随着民族化过程而逐渐被强化了。每个民族总希望自己民族特点在外来文化的

① 林涛、丁原：《中亚东干族考察纪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② 海峰：《中亚东干族的双语化进程及其民族语言观的形成》，《新疆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影响中能够保留下来。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多数民族自认的本族文化中核心的区别性特征。因此从内心的愿望来讲,东干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在着强烈的保存意识,并认为它是自己这个群体区别于周围其他民族的典型性标志,因而从意识上强化了它的独特性和民族性。

2. 东干人的经济生活特征

对一个民族群体来讲,迁徙总要丢掉一些东西,丢掉一些适应了的文化,到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重新学习和重新适应。中亚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关系不同于中国,所以东干人到中亚之初就对其产业结构作了调整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如扎尔巴克秋的东干人起初试图播种水稻,但不久就因为土质不好、收成低而放弃,以后转种谷物和蔬菜,有蒜、葱、辣椒、萝卜、茄子、西瓜、甜瓜、白菜、笋子、黄瓜等。而在七河流域的阿历克山德罗夫卡的东干人,开始在楚河沿岸租赁土地播种水稻,并获得了不错的收成,成为该地区最早栽培水稻的“开拓者”。在普尔热瓦尔斯克,东干人也在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方面有其领先作用。他们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种植亚麻、油菜、药用罂粟及豆类产品,并不断扩大该类作物的种植面积。世代为农的东干人,在经营农业过程中表现出的才干,令周围的民族惊羡不已。东干人居住的地方都有花园和菜地,他们种上了各种蔬菜和水果,其中许多品种是当地人从未见到过的。

与中国回族社会一样(回族人口在我国的大分散状态,决定了该民族内部不可能有统一的或共同的经济生活,但她却有大体一致的经济生活特征,这就是农商兼营,多业并举),中亚东干人群体“农商兼营”的特点是较为明显的,这一极富个性的经济生活特征,恰好是东干人所置身于其中的新的自然生态环境使然的。所以当他们在商品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地区时,很快站到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前列,极大地繁荣了中亚经济市场。他们以其勤劳和农业技巧及其灵活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的增加农副产品的品种和

提高产量,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将剩余部分尽可能的投向市场。

由于与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游牧民族杂处及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东干人不仅学会了牲畜饲养的技术,而且在此行业得到一定发展后很快将其商品化,他们将牲畜投入市场。如在伊尔德克乡有部分东干人从事牲畜贩卖业。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克处于集市,优越的条件为东干人从事该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他们在城市中和乌兹别克商人建立了业务往来,有些人因而建起了商栈,从而成为当地最富有的人。

3. 东干人的文化特征:

对东干人而言,由于历史原因,几乎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他们分散居住在中亚三个国家,但凝聚东干人情感的群属意识,却将他们连结为一个统一的群体。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东干文化中的“回回”特色这个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已经实现了东干化的“回回”这个角度去理解。诚然,东干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坚持回回文化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并没有使这一文化不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东干人及其先民在适应环境发生根本置换的过程中,其首要变化的就是回回的文化方面。而这一变化,是使之适时地强化了汉文化对它的影响。

众所周知,建立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回族文化,是在这两种文化撞击、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本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这一点已为中国回族在强大的汉文化圈中仍以其独特的文化个性而存在的实际所证明。与回族文化所处的环境不同,东干人处在远离汉文化的伊斯兰文化的氛围内,生存环境正好与回族人调换了一个位置。但东干人并没有因环境的关系或同是穆斯林的前提下逐步淡化汉文化,而向当地民族趋同,而是继续以回族先民初入中国时的方式,即学习、吸收一切能为我所用的因素以求得生存,但又牢固坚持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准绳,即使接受的汉文化内容也附上了特有的“伊斯兰色彩”。显而易

见，东干文化中的汉文化成分是他们区别于周围穆斯林民族的主要内容，如汉语、生计方式、建筑风格等都被他们在适应中巧妙地保留下来了。当然，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加强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东干文化说到底是具有中亚地域特色的回族文化，或者说是回族文化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延伸和发展。

从东干人的发展过程这一个案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环境置换对于群属特征的形成确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甚至达到了不可抗拒的程度。东干人的形成：就是环境置换。在一个族群人口处于分散状态下，借助强有力的相同或相似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仍然能够为一个族群的延续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本文作者：新疆昌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 光

On the Replac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Group: Taking Donggan as an Example
Ma Dengjie

Abstract: In a sense, the formation of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Donggans' ethnic group is related to the totally changed environment, on which their ancestors depended for their existence. Taking Dongg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oretical issues relevant to the replac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group.

Key words: ethnic group; the replacement of environment; Donggan

观点选萃

国有民办高校两位一体法人治理模式分析

黄志兵

宁波大学教育学院 2007 届硕士研究生黄志兵指出：国有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构建科学高效的法人治理模式，是国有民办高校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国有民办高校复杂的产权关系，也决定了其法人治理模式的特殊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经济转型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开始不断深入，教育的办学主体日益多样化。而国有民办高校就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国有民办高校，有时也称公立转制高校，它主要是指原国有高校在不改变国家或政府拥有学校财产归属权的情况下，将学校的经营权（包括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等）的主体转到民间，运行机制完全采用民营方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目前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等民办公助高校也属于国有民办高校。

构建国有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模式过程中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注意处理好办学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第二，要注意从制度层面来明晰教育产权；第三，要注意加强党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融合。